



## 缪敏：为革命生 愿为革命死

缪敏（1909年—1977年），原名缪细，曾化名李祥贞、宋大妹，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南昌、鄱阳秘密机关工作。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与方志敏结成革命伴侣。

缪敏1909年11月4日出生于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葛溪乡缪家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27年3月，她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她经团组织推荐，到中共江西省委一个秘密机关从事交通员工作。在此期间，经邵式平、胡德兰夫妇介绍，她认识了时任江西省农委书记、省农民协会秘书长的方志敏，并很快由对方志敏的崇敬发展到恋爱。方志敏对这位时年18岁、浑身充满革命朝气的姑娘也很满意，他对缪细说：“我赠你一个‘敏’字，作为订婚礼物吧！”自此，缪细改名缪敏。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时任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的彭湃来江西视察工作，得知方志敏和缪敏两人相爱却

迟迟未婚的情况，便笑着对方志敏说：“共产党人又不是和尚，就让我做个证人吧！”于是在1927年6月上旬的一个晚上，方志敏和缪敏在秘密机关二楼举行了婚礼。

结婚3天后，方志敏被派到赣西开展农运工作。方志敏当时化名李祥松，他为缪敏取名李祥贞，两人以兄妹相称，作为以后秘密通信的联络用名。

1927年南昌起义后，缪敏被党组织派往设在鄱阳县城隍庙街2号的赣北特委秘密机关工作。她用李祥贞的名字扮作佣人，认房东柳兰娇为干娘，以此掩护开展工作。这年11月的一天深夜，正当特委举行重要会议时，由于秘密被泄露，特委机关被敌人包围。在这千钧一发之

际，担任警戒的缪敏迅速销毁文件，并发出暗号，使前来开会的省委特派员刘士奇和军事部长胡烈等人顺利脱险。

1934年10月，方志敏临危受命，担任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军政委员会主席，率红十军团北上抗日。缪敏因怀有身孕，留在地方坚持游击战争。由于行踪被泄露，1936年6月7日深夜，缪敏在德兴县万村山棚里被敌人抓捕。缪敏被捕后，驻横峰县的国民党军71师师长亲自劝降，并在县城召开大会，要缪敏发表自首讲话。缪敏当时发着高烧，身上流着血，但她坚强地挺立在台前对群众说：“请大家不要忘记苏维埃，不要忘记共产党，革命一定会胜利，红军一定会打回来的！”

由于劝降无效，缪敏被国民党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囚禁在南昌女子监狱。在得知方志敏已于1935年8月6日被敌人杀害的噩耗后，她悲痛欲绝。女看守主任对她说：“你才26岁，何况丈夫已死，为什么有太太不做，难道要在牢中把头发坐白？”缪敏义正词严地回答说：“我为革命生，愿为革命死，也愿为革命把牢底坐穿！”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日，经我方强烈要求，缪敏才被放了出来。新中国成立后，缪敏先后担任了中共上饶地委组织部长、妇委会书记，江西省总工会组织部长、省卫生厅副厅长等职。1977年7月9日，缪敏在南昌家中因病去世，享年68岁。（据江西省妇女联合会网）

## 赵芝兰：启东最早为革命捐躯的女烈士

赵芝兰（1911年—1930年），是启东最早为革命捐躯的女烈士。1927年，年仅16岁的赵芝兰跟哥哥赵克明一起参加了革命。1929年冬，赵芝兰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永兴区农民协会妇女部主任。1930年12月9日5时，赵芝兰被敌人用大刀砍死在海门三阳镇西南角的坟园里，年仅19岁。

1911年8月，赵芝兰生于崇明外沙蔚兴镇一个佃农家庭。1927年，共产党员顾南洲等在赵芝兰的家乡活动，年仅16岁的赵芝兰跟哥哥赵克明一起参加了革命。每逢地下工作人员到她家开会，她就和嫂子一起，安排食宿，警戒放哨，有时彻夜不眠。她还担任了义务交通员，每次都机警地躲过敌人的耳目，圆满完成任务。

1928年4月，赵克明组织永兴地区农民安平村恶霸地主沈继贤斗争，赵芝兰负责组织妇女队。她穿着黑布夹袄、银条布裤子，举着小旗走在前面。农民队伍到了沈继贤家门口，沈继贤气焰嚣张，站在台阶上叫嚷：“地主收租是几千年的王法，天经地义。”赵芝兰怒不可遏，跳上台阶说：“一块田从种到收，农民颗粒汗珠摔成八瓣，你们不劳而获，大租小租逼得穷人无路可走。我家被你逼得无法生活，大姐卖给人家，二姐做了粮食，这难道是天经地义的吗？这不只是我家的苦难，我们大家都是同样的啊！”赵芝兰的话让群众压抑在心头的怒

火爆发了，他们高喊：“我们要减租减息！”面对被激怒了的群众队伍，地主只好同意减免大租三成，取消小租。

一个月后，赵芝兰组织妇女参加了大兴村农会和平安村农会联合举行的减租斗争，又获得了胜利。

1929年冬，赵芝兰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大兴区农民协会妇女部主任。1930年4月30日，赵芝兰参加了中共启东县委发动的农民暴动。下午，赵芝兰等一路人马直奔斧角镇，捣毁国民党区公所。赵芝兰组织妇女在镇上贴标语、浆糊用光了，便挖一桶水泥巴代替。黄昏时分，汇龙镇的警察才出动，而赵芝兰他们早已胜利返回。

1930年8月8日，中共启东县行动委员会组织“八八暴动”，准备建立苏维埃政权，并营救4月30日被敌人逮捕的中共启东县委委员赵克明等人。暴动队伍分三路冲进汇龙镇县衙门，赵芝兰和大家一起冲进监狱，救出了赵克明和被关押的群众。

由于敌强我弱，暴动以后，大部分党

员干部转移疏散了。赵芝兰布置一些妇女转移后，连夜到二效一带工作。她在那里面动了40多天，疏散了一批干部，又回到家乡坚持斗争。家已被敌人烧毁了，亲人不知去向。天黑了，她没有饭吃也没有地方住，与组织上又失去了联系，为了不连累群众，她就睡在田野里。在白色恐怖和艰苦的环境中，她仍然活跃在乡亲们中间，鼓励乡亲们不要灰心，坚持斗争。

反动地主沈继贤的儿子沈士骥，刻骨仇视农民运动。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了“八八暴动”后，他充当了启东县政府的密探，派遣心腹，化装成磨剪刀的、捉鸟鸦的，费尽心机侦查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9月下旬，赵芝兰在陈白郎家被捕，第二天被沈士骥解往海门三阳镇。敌人将她吊在屋梁上，用皮鞭抽，用辣椒水灌，又用香火烫她的腰部，用针刺她的手指，拔头发，上老虎凳……用遍了残酷的刑罚。赵芝兰昏过去不知多少次，但她就是一言不发。

敌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国民党

驻军的一个团长顾天明亲自出马，他对赵芝兰说：“姑娘，你还年轻，只要你承认是共产党员，说出你知道的共产党员，我就保证你吃穿不愁，一生荣华富贵。”赵芝兰指着敌团长骂道：“你这个刽子手，休想从我口中得到什么。你们这批强盗，人民总有一天会向你们讨还血债的！”敌团长黔驴技穷，喝令用刑。几个人同时把几根烧红的铁条向赵芝兰的前胸后背烫去，赵芝兰大叫一声，昏死于地。当她被冷水浇醒过来后，仍痛骂敌人。敌团长恼羞成怒，下令将赵芝兰的舌头割下。赵芝兰喷出满口鲜血倒了下去。没有了舌头，赵芝兰还有眼睛，还有双脚。她瞪大双眼怒视敌人，用双脚连连蹬地表示反抗。敌团长疯狂下令：“拉出去斩！”刽子手扑上来抓住赵芝兰，赵芝兰用力推开他们，从容不迫地理了理头发，大步跨了出去。

1930年12月9日5时，赵芝兰被敌人用大刀砍死在海门三阳镇西南角的坟园里，年仅19岁。（据启东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 北京时间也是“西安”时间

什么是北京时间？北京时间与古城西安有关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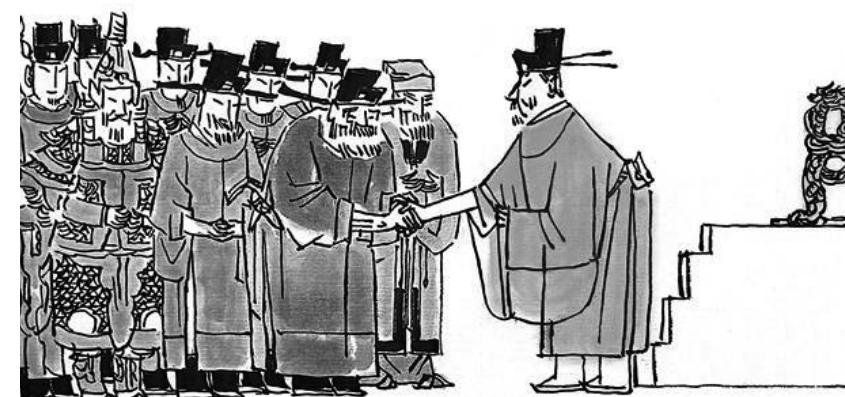
北京时间并不是北京（东经116.4°）的地方时间，而是东经120°的地方时间。因为北京处于国际时区划分中的东八区（东八区包括的范围，以东经120°为中心线，东西各延伸7.5°，总宽度为15°的区域），同格林尼治时间（世界时）整整相差8小时，即北京时间=世界时+8小时。

我国的标准时间虽然称之为北京时间，但北京时间的生成和对外发布却并不在北京。而是在陕西省西安市和蒲城县。因为，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就在西安市临潼区和蒲城县。

北京时间源自国家授时中心，是由9台铯原子钟（铯钟）和2台氢原子钟组通过精密比对和计算实现，并通过卫星与世界各国授时部门进行实时比对。西安临潼区国家授时中心和陕西蒲城的国家授时中心（二部），在职能上有所分工，西安临潼方面主要负责生成，陕西蒲城方面主要负责对外广播。

国家授时中心为什么设在西安？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的窦忠和刘永鑫介绍，新中国成立初期，授时工作提上日程，当时的主要手段是通过无线电来传播时间信息，而无线电的特性就是从中心向四周辐射，所以授时台应该选在国土的几何中心，便于覆盖全国；其次，时间对于国家安全、民众生活都有较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有自己独立研究的时间。作为一项涉及国家安全的技术，应处于内陆地区，而远离东南沿海。基于以上考虑，20世纪60年代，国家决定在内陆腹地从速建设一个专用授时台。中国科学院组织上海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和北京天文台专家，多方勘测，按照“靠山进洞”的战备要求，选定陕西省蒲城县唐宪宗景陵附近的金帜山，建设西北授时台。1966年开始建设，1970年基本建成并定名为陕西天文台。2001年，陕西天文台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

多年来，国家授时中心以时间服务为本，开展授时工作及相关研究。目前，我国的授时服务和时间频率研究水平整体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据《西安晚报》）



（资料图片）

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读书人即使是寒门子弟，因此有了参加国家人才选拔的机会，所以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慨叹。

正因为如此，科举考试从一开始就有违背公平竞争原则的各种营私舞弊和投机取巧现象发生。因此，防止舞弊就成为科举考试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也带动了科考制度的不断完善。

科举制度从隋代肇始。到了唐代，为保证公平取士，朝廷不断完善科举考试程序、评判标准，采取了各种防范科场舞弊的措施，其中科考的考场即贡院实行锁院制度，就是为了避免主考官和举子的违纪行为而设立的制度，是科举史上的一大进步。科举考试发展到宋代，各项制度不断完善，尤其是防止作弊上。北宋咸平年间，因为一次科考舞弊案，而出台了弥封试卷的措施——弥封制。本文重点讲述发生在明代有关科考舞弊的著名事件及其他。

明朝建立后，为了发现和选拔人才，明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视科举考试，对舞弊事件格外厌恶。明洪武三十年二月，又到三年一度的会

试，朱元璋在主考官的选择上很是慎重，他反复斟酌，最后选定85岁高龄的翰林学士刘三吾和白信蹈等人为主考官。科考正常进行，最后录取了宋琮等福建、江苏、浙江等南方籍考生总计52人。到了三月，朱元璋亲自主持廷试进行了策问考查，最终钦定福建陈安为状元、应天尹昌隆为榜眼、浙江刘仕谔为探花，此次考试的录取榜被称为北榜或春榜。

这本来是正常科考流程，但因为“所取宋琮等五十二人，皆南士”，其中没有一个人来自北方，尽管宋代以来的科举考试中试者多为南方人，但像这样北方士子全部落第的情况却是前所未有的。考生都知道主考官刘三吾是湖南茶陵人，北方士子就以此为由，认为南方籍的主考官刘三吾等人科场舞弊，偏袒南方士子，有偏私其乡的嫌疑。北方士子在京城闹得越来越大，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他非常生气，“帝怒所取之偏”。为了公平起见，朱元璋任命张信等12人组成复查组，其中状元陈安也被要求参加，复查组对所有试卷进行复查。复查组认为，北方士子的试卷的确不如南方士子的，甚至北方士子的试卷还屡犯

忌讳的现象出现，因此拿出了维持原榜不变的复查结果。

复查结果公布后，北方士子仍然不服，称复查组故意挑出北方士子错漏较多的试卷复查，欺罔皇上。朱元璋这次真的发怒了，悉诛信蹈及信、安等，戍三吾于边，把张信、白信蹈、陈安等人都一并处死；刘三吾因为年迈免死，被贬戍边。

为了平息北方士子的愤怒，朱元璋又亲自组织阅卷，在北方士子的试卷中挑选文理优长者，录取任伯安等61人，于当年六月再次进行廷试，发榜“以韩克忠为第一，皆北士也”，所录全部为北方士子，事件遂告终结。这次的录取榜则被称为北榜或夏榜。

这个事件告终，但也为实行“分省录取”的制度提供了契机。本来明代乡试的举人数量在朱元璋时期是没有定额的。洪武十七年，朱元璋曾专门下诏令诸州县不拘乡试额数。这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台的政策，因为当时刚刚经历元末的战乱，读书人稀缺，百业凋敝，所以下限制名额，有利于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到了永乐皇帝朱棣执政后，天下承平日久，各地人丁兴旺、文教昌盛，如果不限定各地举人数量的话，南榜北榜的事件就会重现。所以，明仁宗朱高炽洪熙元年决定，各地采取分省定额的方式来决定乡试举人的数量。这种分省定额的确立，最大限度保证了制度上的公平，促进了北方及西南偏远地区的文教建设，同时也增进了南北士子之间的相互交流，发达地区的士子想方设法落籍在偏远地区，那样得中的概率就高，相当于今天的“高考移民”。明代的“南北分卷”及“分省定额”制度被清代沿用，甚至与今天的高考也有许多相似之处。（据《西安晚报》）

## 拾遗

### 红色戎装忆峥嵘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套军装



红四军在长汀首次统一的全套军装，现收藏于古田会议纪念馆。

一颗红星头上戴，两面红旗领子绣。在福建古田会议纪念馆，珍藏着一套特殊的粗布军装：军帽为八角帽，缀有布质红五角星帽徽；军装上衣为中山装式样，正面共有4个口袋，衣领上镶有两块红布做的红领章；裤子是半大的阔腿样式，配有一副绑腿。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第一套正规军装，1929年3月设计制作于福建长汀。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诞生。然而，人民军队在成立之初，并没有自己的军服。当时，起义部队大多身着大革命时期原国民党军服装。为了在夜间区分敌我，起义部队在脖子上系上红布条、在手臂上绑扎白毛巾。

1928年4月，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会师，将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随着井冈山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从1928年7月开始，敌军一次又一次向井冈山发动“会剿”。在敌军长期封锁下，红军生活面临空前困难，战士们为了保暖，只能是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

1929年1月14日，为打破敌人封锁、解决经济困难，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出击。3月中旬，红四军主力进至闽西长汀，歼灭了国民党福建省军第2混成旅2000多人，击毙旅长郭凤鸣，解放了长汀县城。随后，毛泽东将部队改编为3个纵队，每个纵队1200多人，装备500多支枪。战斗彪炳的红四军，服装却五花八门：工人农民的粗布衣服、缴获的军装长袍……毛泽东感慨道：“部队是‘焕然’了，还没有‘一新’啊！”

当时的长汀物产丰富，富商云集，手工作坊遍布城乡。红四军在攻打长汀时，便缴获了郭凤鸣在该地的被服厂。此外，解放长汀后，红四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没收了10多家反动豪绅财产，并向商人筹借军饷，很快筹得5万元。对于这笔资金的用途，大家意见不一。时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提出，拿出一部分钱来购买布料、制作军装。于是，红四军前委决定，在当地赶制4000套军装，以统一军装。

红四军经过反复研究论证，最终确定了新军装的款式。之后，时任红四军军部副官长杨至成积极招收缝纫工人，为红四军赶制军装。经过工人们的齐心努力，终于在最短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了军装制作任务。

红四军战士穿上统一的军装后，军容军貌焕然一新。部队在长汀县城南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以整齐威武的军容，接受了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的检阅。

这套红军军装，不仅展示了红军战士的军威、军容，而且满足了红军当时的战斗需要，灰蓝色布质便于隐蔽和自我保护，绑腿让红军战士机动灵活，便于行军作战。自此，红四军战士们穿着这套军装，开始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光辉历程。（据《中国国防报》）

## 文人轶事

### 朱自清改名

朱自清本名自华，号实秋。1917年夏天，北大特许报考本科的学生可以凭同等学力参试，而无须预科毕业文凭。这样，他提前一年考进了文本科哲学门。为了跟所憎恶的社会上种种腐败和污秽划清界限，勉励自己在困境中也不同流合污，就改名“自清”；又感于家境败落，弟妹幼小，自己1916年底又结了婚，自觉要尽快分担起家庭的责任，就必须抓紧学习，自强不息，奋发进取；于是，借用《韩非子·观行》中“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自缓；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的典故，改字“佩弦”。

朱自清也没有违背改字“佩弦”的本意。他不仅用4年时间修完了北大预科和本科原需6年学完的课程；还在以后拟定了无数个读书计划，一个一个地完成；而且以不到50岁的年纪写出了约400万字的作品。勤奋、刻苦的学习和工作，占据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

朱自清改名，“名副其实”，一生清白而勤勉。（据《人民政协报》）

## 林徽因写论文别具一格

林徽因是一代才女，也是著名的建筑学家，她不仅有诗人的想象力与美感，还有科学家的缜密和求实精神。

同样是写论文，林徽因写的论文和别人的很不一样。林徽因的气质里有东方的典雅之美，她通晓英文，对汉语和古文的修养造诣也颇深。林徽因把枯燥的学术论文当成美文来写，她笔下的木石结构有了灵性，字里行间流淌出诗样的韵律。

林徽因在她的《平郊建筑杂录》这篇文章里写道：“无论哪一座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化，由温雅的儿女佳话，到流血成渠的杀戮。他们所给的‘意’的确是‘诗’与‘画’的。但是建筑师要郑重地声明，那里面还有超出‘诗’‘画’以外的‘意’的存在。眼睛在接触人的智力和生活所产生的一个结构，在光影恰恰可人，和谐的轮廓，披着风霜所赐予的层层生动的角色……”“是谁笑成这万干风铃的转动，从每一层琉璃的檐边摇向云天？”诗歌的灵感、哲学的思维、历史的沉积一起涌向笔端，她的论文写得别具一格。（据《联谊报》）